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朱清时 主 编
李传玺 执行主编

胡适

李传玺 编

卷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朱清时 主 编
李传玺 执行主编

胡适

卷

李传玺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胡适卷 / 李传玺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36-8109-8

I. ①现… II. ①李… III. ①高等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0976 号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胡适卷

XIANDAI DAXUE XIAOZHANG WENCONG HU SHI JUAN

出 版 人: 郑 可

质量总监: 张丹飞

策划统筹: 王 骏 钱 江

责任编辑: 钱 江

装帧设计: 阮 娟

技术编辑: 王 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 (0551) 63683011, 63683013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一个日子。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戊戌变法失败了。一边是慈禧再度“训政”,一边是废黜光绪,废除新政,对倡导变法维新人士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其中独有一项“成果”经过一个老人的巧妙运作保留了下来,那人是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那“成果”便是京师大学堂。

也许是经过变法者心血与鲜血的滋润,这粒中国现代教育的种子开始了它的倔强生长。

至1949年,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包括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它的格局、架构已基本形成。

由此,人们常常发问: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袁氏复辟,走马灯式的北洋政府;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水深火热几不聊生;外敌入侵,十四年抗战,虽取得胜利,接踵的又是国共内战。如此时空背景,常常使课堂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能够生长,且健全了各门类基础学科,诞生了一批名校,培养出了惠及后世的大量杰出人才,在教学相长过程中走出了大批大师

级的教育家、科学家、思想家。为什么？

钱学森先生曾这样发问。

每个人一说到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时，总会想到蔡元培先生，总会想到西南联大，更会这样发问。

二

2010年3月14日下午，首都机场。全国两会结束，各地的政协委员返程。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正坐在过道边的椅子上。那段时间，他是热门人物，一直被媒体包围着，此刻他好像很累很疲倦，但仍有记者不停地同他说着教育的热点话题。作为安徽政协委员向中央报送信息的联络员李传玺也站在旁边听，并不时对朱清时先生切中肯綮的评论报以由衷的赞美。

“你是哪家报社的？”朱校长问李传玺。

《江淮时报》副总编常河先生站在旁边，向朱校长介绍了李。

“噢，你研究胡适啊，我对30年代那批大师，尤其是那批大师级的教育家非常佩服。”

这句话也埋下了一粒种子。

2012年初，时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就职的王骏先生询问李传玺，今年有没有好的选题。

李传玺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在首都机场与朱清时校长谈话的画面，以及朱先生最后的那句话。何不请朱清时先生担纲编选一套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王骏向社领导做了汇报，很快得到了同意。可朱清时校长能同意么？初春的一个下午，李传玺拨通了朱清时校长的电话，虽然天气不热，却紧张得一手心汗。没想到朱校长听完了介绍后，欣然同意。

于是有了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书。

让我们倾听一下那些大师们的声音。声音都不是那种激昂慷慨式的，很平和，却更入灵魂。

蔡元培先生：“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张伯苓先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蒋梦麟先生：“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学校之惟一生命在学术事业”，“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畀以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阻挠也”。

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胡适先生：“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和工作人员”，“只有在自由独立原则之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

竺可桢先生：“科学精神就是求真，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

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

不需要再引了,读着这些话,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也许自会得出本文开篇所提疑问的答案。即使不是,你也会强烈感受到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教育胸怀。此书还选收了大量大师们其他方面的论文甚至美文,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充分领略到大师们多面的风采。

李传玺

2015年3月

目 录

1	导读 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台阶上
9	文学改良刍议
19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22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35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39	三论问题与主义
46	四论问题与主义
	——论输入学理的方法
51	杜威先生与中国
54	易卜生主义
69	不朽
	——我的宗教
77	新思潮的意义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85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94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97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
104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16	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
119	论学潮
123	我们所应走的路
127	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
133	制宪不如守法

137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142	公开荐举议 ——从古代荐举制度想到今日官邪的救正
146	建设与无为
151	“五四”后新思潮运动的意义
152	北大校友“五四”聚餐联欢会上的讲话
154	自由主义是什么？
157	人生问题
160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台北市编辑人协会欢迎会上讲词
165	容忍与自由 ——《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
173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178	大宇宙中谈博爱
180	拜金主义
182	时间不值钱
184	差不多先生传
186	业余讲演
190	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话
193	治学方法
196	知识的准备
204	为什么读书
209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211	论家庭教育
213	八股的起原
216	书院制史略
221	书院的教育
222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244	找书的快乐
249	国语运动的历史
252	论无文字符号之害

257	论中学的工具教育
259	教育学生培养兴趣
263	对于新学制的感想
268	论大学学制
271	谈谈大学
274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277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281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286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293	提高与普及
296	学生与社会
301	考试与教育
307	选科与择业
309	大学的生活
	——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314	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
318	在北平市立高工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 上讲话
320	工程师的人生观
325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330	教师的模范
332	学术救国
336	《傅孟真先生遗著》序
339	教育家张伯苓

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台阶上

李传玺

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台阶上，不是我，而是他们——胡适和陶行知等。

那是胡适留学期间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他和老乡陶行知等六人坐在哥大台阶上，两手交叉，两腿交叉，左手搭在右手上，左腿折向右腿后，手、腿的相互搭配如此“规则”一致，难道说理性训练已化入不自觉的举手投足间？

这张照片中胡适的表情最生动、最轻松，满面灿烂的笑容，满面自信的笑容。

1

1917年元月27日，哈佛大学“女校友协会”举行“年宴”。此时的哈佛校长康福邀请美国前总统塔夫脱和康奈尔大学校长休曼前来演讲，休曼因故不能来，于是康福推荐胡适代表休曼来演讲。费城位于纽约与华盛顿之间，“已行半途，不容不一访经农（注：朱经农）。故南下至华盛顿小住，与经农相见甚欢。一夜经农曰：‘我们预备要中国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此话激起了胡适的感慨：“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

一人所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这就是要输入学理，盗火给中国，推动中国人思想解放，树立崭新的、现代的科学民主理念。

胡适此时心中充满了一腔豪情，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前世纪之‘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宗教改良之运动）未起时，其未来之领袖牛曼（Newman）、傅鲁得（Froude）、客白儿（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写其所作宗教的诗歌成一集。牛曼取荷马诗中语题其上”，其诗为“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胡适将其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由这句诗，胡适引申道：“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这个豪情就是要改造中国，就是以新中国之“新”为已任，而且甘做先锋，甘做旗手。

虽然此时省有倪嗣冲祸皖，国有张勋复辟，使胡适“思之怅然”，并发出如下感慨：“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毕竟《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已经在《新青年》发表，并且得到陈独秀等人的热烈赞同与呼应，“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则为吾友之声援”。胡适回国经过日本时，看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便买了一本，内有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和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两文不仅是对他首举义旗的进一步响应，其中的观点也让他感佩。正是在这种大势的鼓舞下，胡适的情绪并没从根本上受到影响，而是沿着既定的“豪情”路线继续前行。在回国船上，他开始关注西欧各国“国语”的形成，以及与文学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正是他回国后很快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孕育期。

正是在这种“豪情”的支配下，胡适终其一生认定只有从教育、思想与文化入手才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新生奠定基石，终其一生决心做一个将真理与光明传导给中国人的启蒙主义者。1917年7月10日，胡适回到上海，在新旅社里发下一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

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参加有关抗战问题的谈话会，7月12日从南京乘飞机飞往庐山。在飞机上，胡适想到了二十年前的誓言，虽然时间已经久远，但仍然记忆犹新。为了这个誓言，当20世纪30年代有人诚邀他加入国民政府时，胡适这样拒绝：“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实在不是图一点虚名，也绝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有理由高兴并自信。照完相，胡适站起身和同学们一一握手拥抱，就此告别。

那天他们照相的地方大约是哥大图书馆。进入哥大是一条宽宽的红砖道，从此道登上图书馆，应该有好几十个台阶。这使图书馆的门厅显得更加巍峨挺拔。胡适一阶阶走下来。天空很纯净，阳光很灿烂。迎着阳光走去的胡适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背影。

胡适回来了。应该说 he 很好地挥洒了自己的豪情，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有人为归国后的胡适作了这样一个定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他虽然没有完成什么，却开创了一切。

他坚持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他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由此他参与编辑或创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刊物，倡导用独立的精神、反省的态度、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人的思考，来宣传民主与自由。他认为“君子”立

言应该“无所苟”，就是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凡立一说，建一议，必须先对此说此议万一实行时可以发生的种种结果都一一想象出来，必须自己对于这种种结果准备承担责任”，而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他要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发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敢于诤谏的传统，“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由此，胡适公开挑战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威权政治。针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所提出的训政主张，胡适由各种“政府机关”和“党部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现实出发，庄严提出，“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针对丁文江、蒋廷黻等人提出的“开明专制”，胡适始终坚持“民主宪政”的主张，并明白归纳了至今让我们思考的各种“好处”：“民主政治是常识政治”，“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注：这是胡适顺用别人的提法，无贬义）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针对国民政府在许多地方开展的盲目害民建设，胡适更明确指斥：“没有一个国家能靠着盲目的建设得着国际地位的，也没有一个政治领袖能靠着害民的建设得着人心的拥戴的”。针对寇氛日深的严峻形势，胡适提出公开外交，争取国际道义上的认可与支持，更提出了

“苦撑待变”持久抗战的战略主张。他不仅准确预测了抗战初期的态势变化,更准确判断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警告蒋介石“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无论我们如何屈辱,都谋不到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痛苦与毁灭”,“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主翻身的机会”。基于此,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才毅然决然地委派他这个没有丝毫外交经验的人出任驻美大使。

由此,胡适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建立了一套比较全面的基础范式。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出发,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不仅直接推动了文学表达方式的根本变革,而且迅速刷新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风貌,甚至开启了惠及千秋的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解放之窗。胡适并没就此止步,结合回国途中有关“国语”的思考以及文学革命的讨论,很快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认为“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表面上看,他是在探讨国语与文学的关系,将白话引向规范化的道路,实际上,胡适已经切实把握住了一个国家建立自己规范化通用语言的核心,并首次提出了普通话的概念以及普通话的基准区域与文本。为了与标准文本相配套,胡适开始推动并积极参与编纂国语教科书,呼吁建立统一规范的标点符号与文法,推动亚东图书馆组织出版新式标点中国古代经典白话小说,建立全社会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与遵循。从方法论的角度,胡适糅合杜威哲学与中国传统治学尤其是清代学者治学方法,提出整理国故和进行国学研究。在哥大与一帮朋友讨论文学改良时,胡适就化用陆游的诗自勉: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一边从理论上提倡,一边亲自试验,以作品为“范式”,推出《尝试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国语文法概论》、《〈红楼梦〉考证》等。无怪乎20世纪50年代大陆批判胡适时,曹聚仁撰文指出,许多批判就是用胡适的方法、胡适的例证甚至胡适的语言来批胡适,这样批不仅不能批倒胡适,相反是在传播“胡适”。

由此,胡适给中国科学与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一条比较明确的路径。胡适注重科学与教育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胡适于1961年

11月16日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演说中说,“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与革命”。胡适注重科学与教育发展的整体规范。抗战爆发后的庐山谈话会上,胡适提出战时教育应该是“常态的教育”,教育仍然要保持其独立性。1946年底的“制宪”“国大”上,他和其他代表提出关于确立教育为立国之本的建议,以及“教育文化应列入宪法专章”的提案。同时期,他又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晚年回到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他拾起当年在大陆的思考,根据吴大猷先生的提议,提出了“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胡适注重科学与教育发展的体制健全。他和陶行知等人积极支持蔡元培先生的学制改革,倡议大学施行选科制,回击安福部议员的批评,并就执行切实谏言,“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研究这个学制的内容”,新制的大部分应该从试验学校办起。针对国民政府建立后的“统一学术机关之令”和“党化教育”,他写信给蔡元培,劝告蔡先生“宜有审慎的态度,周详的准备”,明确表示“自问决不能附和”,决不能“只认朋友,不问是非”。他坚决反对政府对教育的直接干预,“学校作为教学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其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治的漩涡里去”,要“把握着自由独立的传统……因为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胡适注重教育与科学发展的理念培育,并切实躬身践行。胡适曾引述易卜生的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后来反复提及此话。以此为标准,胡适强调要教育学生培养兴趣,须有批评、进取与协同的精神,教师既要爱自由爱独立,也要爱知识爱真理,普通教育应该做到自助助人的地步,大学教育应该以科学研究发现真理为中心,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回国任教于北大时,胡适推动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一系列改革,组织教授评议委员会。他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初期,组织校务会议通过三个决议案——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重组校董会与院系;重视

体育运动，组织运动会，通过为运动会撰写主题歌传达自己的教育信念：健儿们大家向前，只一人第一，但需要个个争先。

在哥伦比亚大学台阶上，不是坐着，而是站着；不是胡适他们，而是我。

胡适一阶阶走下来。

落日将胡适的背影投射得很长很长。胡适的背影被台阶折叠着，像一本本厚厚的大书摞在那儿。

作为一名学习者，更是一名朝拜者，我拾级而上，穿过他的背影，想要拾起那一本本大书。我回过头去，虽然时间已隔九十五年，空间已隔整个美洲大陆和浩瀚的太平洋，但我仍能望见胡适的背影。

胡适正在一步步远去。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起，有了胡适的哥大，应该也算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